

# 修补时间漏洞的工程师

晚报记者 朱保彰 文/图

**阅读提示：**钟表是时间的“持有者”，修表匠则被称作“修补时间漏洞的工程师”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高科技的飞速发展，如今出售手表、钟表的柜台在商场或超市里随处可见。钟表的种类早已今非昔比，机械表不再一统天下，五花八门的钟表应运而生：电子表、石英表、自动表，乃至计算器的计时表等等。如今得知时间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，手机、电脑、电视机、汽车、电子广告牌、楼宇电视甚至孩子们玩的游戏机、MP3。随着计时产品的多样化、电子化，钟表、手表也渐渐从计时工具变成一种装饰品，靠修表维持生计的修表匠也很难觅到踪影了。

## 靠修表改变人生

为了寻访修表表的这一老行当，记者经过多日打探，终于在沈丘县城找到了该县现存的一个修表匠赵同发，他从事修表行业已经有40个年头了。走进赵同发开设的钟表铺，店铺墙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挂钟，破旧的修表台上放着一套修表的专业工具：小螺丝刀、小锤、特制的墩头、放大镜、橡皮吸等等。每有顾客修手表，赵同发总会笑脸相迎，随后就将专业放大镜戴在眼睛上，娴熟利落地旋开表盖，拿起镊子，把零件一个个拆卸下来。毛病小的可随修随拿，复杂的得需要一两天。

赵同发谈起自己如何步入修表行当时，眼里噙着泪。他说自己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，最初是出于无奈，为了找口饭吃才跟随师傅学修表的，自己在4岁多时患有

小儿麻痹症，双下肢严重残疾，只有靠双手扶着板凳才能行走，长辈劝他说只有学门手艺才能养活自己。他学修表时才11岁，到现在修表有41年了。师傅每天很忙，他几乎是靠自己的琢磨和钻研。机械钟表、普通手表，大小零件有100多个，内部的构造更是异常精细，虽然花费了3年多时间才出师，但很多技术都是在他不断地尝试中，慢慢总结出来的一套修表经验。谈起当时学习修表的初衷，赵同发说当时纯属无奈，修钟表是一个不发财却永远不会没饭吃的行当。不过，赵同发娶了妻子还生了3个孩子，又盖了一座小楼，也有了自己的轿车。赵同发感慨地说：“我当时是无奈才学的修表，没想到也改变了我的。”



## 贵在坚守和传承

40多年的坚守，使赵同发的钟表修理技艺日臻完美，来找他的客人中，有不少人都是因为在外地无法修理，而慕名前来的，甚至还有不少周边县市的客人专程请他修理手表，而这些客人送来修理的，往往都是价格昂贵的名表。他掌握的这门“高精尖”的手艺，成就了今天的独门生意。赵同发说，他见过世界各国的许多名表，从国产的上海表、钟山表、海鸥、飞亚达到国际上的十大名表，比如欧米茄、劳力士、浪琴……赵同发说他都见过，也都修理过。采访中赵同发向记者展示了他的高超技艺，他蒙着眼睛，记者将工作台上的一堆手表递到他的手上，让他辨认。赵同发将表拿在手里掂一掂、摸一摸，就知道是什么款式，表壳和后盖是全钢还是半钢，机芯是日本产、瑞士产还是国产的，大概使用了几十年，值多少钱，是否摔过，是否进过水。谈及如何将这项手艺传承下去时，赵同发说，他有两个儿子都不喜欢这个行当，大儿子喜欢体育，正在上体校；二儿子学习成绩优秀正在读高三，梦想着上北大清华。只有小女儿对这门手艺感兴趣，他女儿现在正跟着他学，他希望这技艺以后可以有女儿接手。他觉得女孩子天生就手巧心细，做这个行当也很适合，虽然这个行当赚不了大钱，但靠手艺生活，也算是一条就业的路。

## 信誉比技术更重要

赵同发说，别看现在的修表匠少了，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县城里的修表匠有40多个，最为壮观的时候，整个县府街上修表摊子一个挨着一个，当时人称“修表街”。生意好的时候，来修表的一个接一个，一天能挣五六十块钱。所修的手表有摔坏的、进水的、生锈的、拔发条用力过猛的、被车子压过的，什么稀奇古怪的毛病都有。但只要经他的手一捣鼓，基本上都能“药到病除”。

修表业为何从昔日的如日中天沦落到现在的几乎无

人问津？赵同发分析说，不仅有市场和时代发展的原因，更多的是和修表匠不守信誉、漫天要价、偷换零件等自身因素有关。以前的同行现在都纷纷改行干起了与钟表无关的行业，有的靠开三轮车营生，有的靠打零工来养家糊口。他为什么能靠修表养家糊口？赵同发说，一是靠自己的技艺，二是靠客户对他的信任，但更重要的还是靠与时俱进的经营理念。许多顾客的电子表耗尽了电池就以为是坏了，拿去找他维修，其实只需要换块电池而已，但赵同发却并没有借此忽悠顾客。尽管技术含量低，维修费用低，但赵同发从来对电子表的维修都是一丝不苟的，哪怕是再廉价的电子表，只要顾客找到他，他都认真维修、从不马虎。他修不好的，甚至不收钱。因为生意是靠良心来赚的，手艺人要有手艺人的尊严。所谓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

## “寻访周口老行当”之二 修表匠

# 开明绅士李国瑗

王荃荣

李国瑗，字绍蓬，因在家中排行第八，大家叫他李八少。祖籍河南省温县，清代迁至周家口，住北新街路西。生于1887年，卒于1950年，享年63岁。

李国瑗的父亲李延英，字宾阁，排行老三。他的大伯李毓英，字俊卿，二伯李耀英，字子襄。幼年丧父，李延英兄弟三人随母亲，寄居在郾城县任教训的外祖父雷兼善家。兄弟三人学习勤奋，毓英中了举人，后充任海运委员。耀英曾任甘肃、新疆考试法官和典礼院直学士兼礼学馆提调等职。李延英成年后弃学，独操家业，于光绪年间发家致富，在北京、开封等城市有商号多处，在商水、淮阳和西华一带有良田万亩，家资万贯。他为人忠厚，爱护佃户，并且兴办慈善事业。光绪十三年（1887年）黄河从郑州一带决口，流入贾鲁河和沙颍河，周家口告急，李延英与当地绅士集议，组织民兵抢险，使周家口转危为安。光绪二十五年（1899年春），周家口遭受饥荒，社会动乱，李延英先后在商南陈会馆（今文化小学）和南门外设立粥厂，赈济灾民。此外，还修桥铺路，方便群众。

李国瑗继承父业，不仅经营着万亩良田和北京、开封等地的生意，还在商水县城开设当铺一座，在周家口磨盘街开设德恒祥银号一座。民国七年（1918年）他被选为河

南省议会议员，曾任河南省财政厅秘书，商水县议会议员，县参事室参事，1946年又被选为国大代表。

李国瑗继承了父辈的传统，助人为乐、与人为善，为周家口人民做了很多善事，笔者听到的以下三件事情，被传为佳话。

第一件，1917年夏，周口沙颍河上游暴雨不停，河水猛涨，几乎与河堤持平。一天，南寨平王亩（现文化小学校址）后内堤出现塌方，水浪上涌，就近难以取土，此时，李国瑗毅然打开麦仓，让百姓用麻袋将其装成包，火速运至溃堤处，将水口堵住，使周口南寨转危为安。此举不仅保全了周口人民的生命财产，也免除了商水、项城、沈丘等县的水灾。

第二件，1924年10月1日，大杆匪首路老九（鲁山人）率领500余人，打进周口，绑架肉票近百人，其中有李国瑗和樊性之。他们将肉票拉到邓城附近，逐个拷打要钱，但是这些人中大部分都是贫苦市民。当时，李国瑗挺身而出，对匪首说：“这些人都是街市贫民，请你将他们放回，钱由我一人负责。”匪首要30万银元，李国瑗答应，并用太平车把30万银元给土匪送去，所有人得到了释放。

第三件，1931年初秋，贾鲁河上游连降大雨，山洪暴发，一夜之间河水猛涨。虽经

地方绅士组织老百姓积极防护，但水位仍在上涨，朱庄北决口，滚滚黄水向东泛滥，淹没庄稼数百顷。为了保护周口北寨，百姓们也不畏艰苦，夜以继日地坚守在河北高庄大堤上。李国瑗把市内所有卖馍挑子的馍全部收买，然后送往抢险工地；他还组织佃户砍伐自己家的树木运往河堤，供打桩堵水使用。经过群众十多天的奋战，终于战胜了洪水，化险为夷，保证了周口河北岸的安全。每遇灾荒之年，他总是组织力量，向灾民供应米粥，建国初期还出资兴修水利。

李国瑗仗义疏财、热心公益事业的举动，受到了周口百姓的称赞，几十年来，这三件事也成了周口人民街巷的美谈，到处传颂。

笔者居住周口北新街路西，与李国瑗是邻居，新中国成立前又与他的小儿子李名遥是同学，直至小学毕业，关系较好，经常去他家玩，对他们家情况略知一二，但令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。

一是他家占地约30亩，坐西向东，住宅设计合理、豪华，居住方便。走进大门，是一个四合院，有南北屋各3间。西屋是一座约100平方米的大会客厅，通过客厅南北两侧进入中院，中院南、北、西屋都是明三暗五的卧室，通过西屋两侧进入后院，后院与中院建筑格局相同，不同的是都有二层楼

房，全院均是青砖铺地，走廊回绕，可避免日晒雨淋。所有房屋全是砖瓦结构，屋顶有各种屋脊兽。通过后院西行，有后门一座，可通文化街。

二是后花园设计精湛，美观怡人。从后院向北，有一个小门，打开小门，一座美丽的花园便展现在眼前：走几步迎面一个荷花池塘拦着去路，必须通过一座小桥西行，真乃“小桥流水，曲径通幽”。过了小桥，满眼皆是名花异树，鸟语花香，使人眼花缭乱。正中间是座青石假山，可拾级攀登。西墙边是一遍茂密的竹林，郁郁葱葱、节节向上。

这座住宅，是典型的明清建筑，可与号称“周口大观园”的黄杏樵别墅相媲美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由周口市和商水县人民政府使用，后由周口地区建筑公司和计量管理所使用，后又盖了家属楼，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全部拆除，实在有些可惜。

周口新中国成立后，李国瑗于1949年携家眷从开封回到周口，受到人民政府的欢迎和热情接待。他为人乐善好施，和睦乡邻，亲朋之间如因婚丧大事或其他情况有困难时，只要向他求助，无不解囊相助，从不计较得失。每逢春节或者春荒，他的佃户有生活困难的，总是积极支持，帮他渡过难关，因此，佃农对他也都感恩戴德和尊敬。